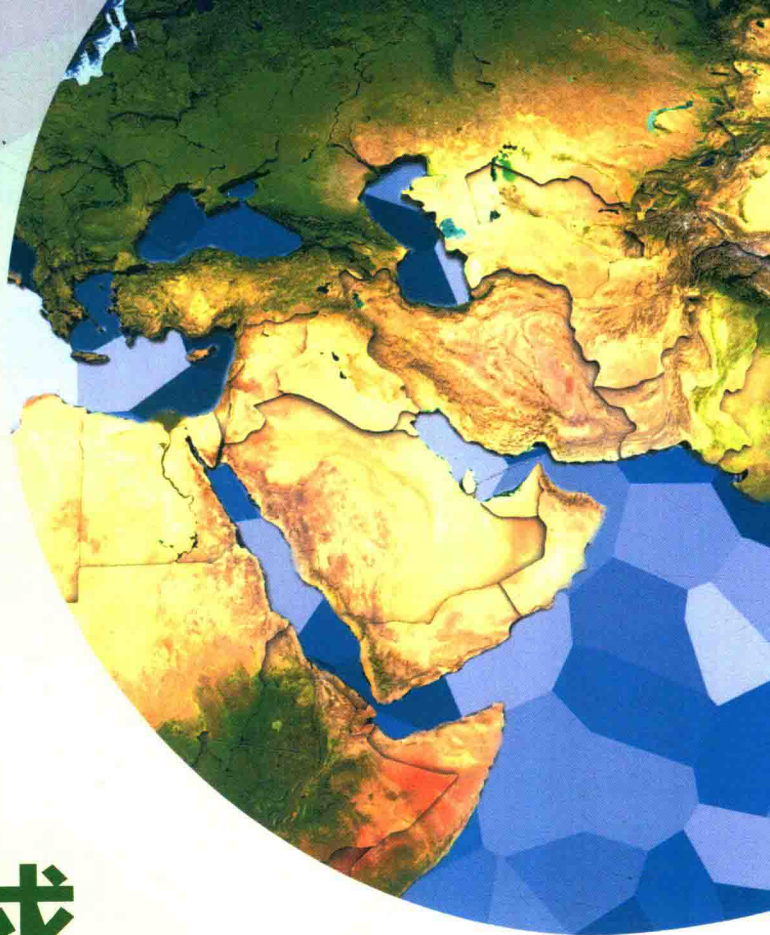




地球 合作计划

从可持续发展转向受控和谐

【俄】亚历山大·别兹戈多夫 著
琢言文化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地球合作计划： 从可持续发展转向受控和谐

[俄]亚历山大·别兹戈多夫 著

Aleksandr Bezgodov

琢言文化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研究和探讨了当下的全球性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世界和谐发展的范式——受控和谐。其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全球化的经济和公平的世界收入分配体系,从全球视角统筹地球资源和全人类的智力资源的租用费收入,以此改善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环境,缓和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推动人类团结,缔造社会和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球合作计划:从可持续发展转向受控和谐:俄文/(俄罗斯)亚历山大·别兹戈多夫(Aleksandr Bezgodov)著;琢言文化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13-15791-1

I. ①地… II. ①亚…②琢…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一体化—研究—俄文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4082 号

地球合作计划:从可持续发展转向受控和谐

著 者:[俄]亚历山大·别兹戈多夫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141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5791-1/F

定 价:48.00元

译 者:琢言文化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1.25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85252189

序言

本书为 Aleksandr Vasilyevich Bezgodov 所著。Bezgodov 博士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跨学科研究中集中钻研全球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他不仅是一位理论家,也是一位实用研究者和研究管理者,投身于研究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企业管理方面提出的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极富价值。

作者提出的“地球合作计划”(Planetary Project,又译“地球计划”)是一项学术性方案,旨在解决当下的全球性问题。该计划提议,通过利用地球层面拥有的资源,整合经济收入和租用费收入,在此基础上创建和谐的全球发展模式。该计划如能顺利实施,将意味着能克服全球化及其引发的各种矛盾,包括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和部分国家的发展失衡。同时,该计划倡议创建和推行公正的世界收入分配体系,分配对象包括全球层面资源的利用所得。这样的体系能够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包括众多正经历严重社会经济难题的国家。

作者认为,在新的地球资源和经济机制的支撑下,我们可以拯救地球生物圈,提升环境健康程度,根除饥

荒疫病,减轻世界战争的威胁,为了当代和未来子孙,推动人类团结,共促世界和谐。在危机重重的当下,这一理念的树立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必将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极大范围内引领起一场鼓舞人心、缔造和平的社会运动。

俄罗斯科学院专职院士
Mikhail Zalikhanov 教授

目录

引言 / 1

第 1 章 全球化世界：必然性、风险与需求 / 5

第 2 章 人类团结：乌托邦还是可选之路 / 20

第 3 章 可持续发展概念 / 36

第 4 章 地球合作计划：前提、基础与定义 / 53

第 5 章 地球合作计划：宗旨、具体目标与方法论 / 65

第 6 章 地球资源基础 / 78

第 7 章 地球财产与世界收入 / 92

第 8 章 地球经济的产业、财务基础与机制 / 104

第 9 章 地球治理机构 / 118

第 10 章 受控和谐概念 / 131

第 11 章 地球伦理 / 145

第 12 章 地球合作计划实施结果 / 155

结论 / 170

引言

不同的人对人类的进化与历史纪元有不同的见解,正如我们对人类物种、道德、文化和文明的合理性各持所见。有人将创世界、耶稣诞生或穆罕默德圣迁作为纪元开端,还有人依靠早期生命形态的考古数据或频谱分析结果来加以划分。现如今,作为科学或哲学争论的核心,时代的划分和人类起源机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至关重要的是 21 世纪之初,人类感到需要前所未有的团结,同时也感到与之相悖的分裂! 我们的想法自相矛盾。有时,我们发现自己站在自我毁灭的边缘,面对威胁,人类有了不同程度的团结意识。但与此同时,利益、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又引发了严重的分歧,将人类归到了不同的阵营。

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今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严峻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挑战的严峻性在于:全球性问题、战争风险和灾难事件,从根源上要追溯到我们自身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以及我们对环境和对彼此的态度——不改变这些,人类社会的威胁就难以解除。百余年来,相比益处而言,人类理性及活动的产物显示出的破坏性更大。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我们被无

所不能的幻觉蒙住了双眼，在事物的自然状态面前产生了漫无边际的优越感。其中缘由可能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之前的目标和生命评估的理念基础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但不论真正原因为何，我们现在都已经发现，如果不解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威胁，最终结果将是全部生命的消亡——快速或缓慢地消亡，取决于造成威胁的因素。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存续，必须真正团结起来，这不但是通过消除威胁、缓和矛盾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首要条件，也是人类踏上精神追寻和技术转型以及长远进化转型之路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撰写宗旨并非是要宣扬全球化。正相反，后文各章节对全球化的过程和思想体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分析。此外，我们提议的“地球合作计划”（又译“地球计划”，下同）蕴含着再全球化的理念基础，旨在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平等的基础上消除单极世界的不对称性。我们相信，自我保护——人类作为生物圈有机组成部分的基本需求——可以作为“地球合作计划”的基础，人类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可以协商甚至牺牲自身利益，在互相折衷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文化进行整合。本书将这一过程称为人类精神领域的大综合。但是，在树立体系之前，我们务必要在总体上设计经济和组织机制架构，来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现在，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存在和发展范式、一种普遍适用且清晰易懂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在人类物种自然和精神需求的强有力基础上。旧的生活模式、文明概念和发展设想只有对各自的绝对化预期，它们无法融合，无法在全球威胁面前把全人类团结起来，也无法推动人类走上解决紧要问题的正确道路。其中包含的价值观相互矛盾，有的甚至全盘否定了人类团结的理念。

但所幸的是，我们也发现，一些理念、原则和最重要的学说、科学理论和宗教价值，在终极含义上却如此接近，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契合，以至于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人文主义理念，其中包含了生命、正义、共同利益、秩序、和

谐等,这些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人文主义理念可以得到全人类的普遍认同。

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改变当代人的思维,从私人利益优先变为共同利益优先,这需要创立新的宗旨、动机、论据和理念。在实际操作步骤中,具体模式、机制和技术也同样重要。如果我们想避免陷入空洞的乌托邦式或科幻式计划,制定出当前人类文明所需的真正有效措施,就必须明白这些措施只能立足于全人类的视角,而不能仅从某个局部出发。因此必须做到:①突破全球主义世界观的狭隘性——该观点认为未来属于所谓的“西方富人”;②将当代人类视为拥有平等权利和机遇的地球人社群;③将未来人类视为关键的地球推动者,与自然共同创造,积极探索外太空。

现在,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独特时代,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新轴心时代(卡尔·雅斯贝尔斯)即将到来的前夕和先导,预示着各民族的发展将有质的飞跃。轴心时代的特征包括主要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和文明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期间浮现了新的文化、科学和宗教运动,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实践,包括非暴力冲突化解以及政治经济折衷的制度化形式。人们期待这个时代能产生比古典和后古典理性更加包容、更加人性化的新理性。它有助于创造和谐的“人—社会—自然”的人类团结图景,而且,新增长点的浮现也将引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方位的整合。

此外,在第六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前夕,我们可以预测到人类理性将经历的巨大变化。在信息学、控制论和纳米技术的时代,理性不仅会成为劳动的客体,还会变成未来文明的推动力。如果能重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性,将其置于新理性和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大综合的框架之中,那么它将扮演管控未来历史进程的角色。我们坚信,这一大型运动的帷幕应该由世界科学家们拉开,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投身于“地球合作计划”。

书中的结论并非作者异想天开。本书简明概述了作者十余年原始研究的部分成果,研究集中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智力圈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的分析与反思。本书归纳了优秀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的理念,阐述了许多与受控发展和进程和谐概念具有系统性联系的观点。因此,本书的宗旨在于调动全世界的智力潜能,来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协调世界发展。

第 1 章

全球化世界：必然性、风险与需求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个世界都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有利也有弊，但这些利弊并没有影响全球化的自然性、必然性和确定性。尽管全球化有庞大的规模和重要的内容，但对其科学性和政治目的的批判并未推倒全球化进程的自然性，也未能说明它是社会发展的“错误”方案。

全球化这一跨学科术语的书面含义是指“传遍全世界”、“具备全世界性质”，源自英语的中“globe”和“global”两个单词。有时也用法语词 mondialisation 来表示。该词源自两个法语词“le monde”和“mondial”。

对全球性(globality)现象的研究要先于“全球化”一词的使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出现。该理论的理论性基础来源于弗拉基米尔·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爱德华·勒罗伊(Edouard LeRoy)和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观点，发展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创立了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论。到了 70 年代后半期，美国和西欧开辟了全新的学术领域，被称为“全球学”，主要

学派包括技术统治学派、环境人口统计学派、存在主义文化学派以及进化决定论学派。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概念外延更广，也更加系统化。社会学家杰森·麦克莱恩(Jason MacLean, 1981)、经济学家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 1983)和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 1985)等美国学者首次使用了“全球化”一词。当然，卡尔·马克思早在 1850 年年末给恩格斯的信中就首次使用了“全球化”一词，用以强调加利福尼亚和日本进入世界市场的全球重要性。

进入 20 世纪以来，以下学者对全球化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乌尔里赫·贝克(Ulrich Beck)、艾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弗朗西斯·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阿纳托利·乌特金(Anatoly Utkin)。但是，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认识全球化的统一通用方法。社会科学观点将全球化集中阐释为以下几个方面：

- 历史学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最成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最初非典型性的特征——多面性(如生产工具私有制、国有制和公有制相结合)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本再分配(与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类似)；

- 经济学从跨国金融、商品和资源市场以及生产力转移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进程；

- 政治学对全球化的关注点在于民主制度与实践的传播，以及传统封闭式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化而对原教旨主义政体的强化；

- 文化学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文化的西方化、“泛美主义”(美国经济和文化扩张)、在最具变通性和竞争力的西方文化符码中消除各民族的种族文化身份；

- 社会学揭示出的全球化本质是从社会层面上转变个人的“生活世界”——社会组织的旧有形式失去主导地位时，个人就变得更自由；对人们而言，社会内部的水平联系愈加重要，比垂直联系的效用更大；

- 科学理论和科学史领域对全球化颇感兴趣，将其视为 20 世纪后半段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将其本质视为文明的一种范式；

- 哲学分析认为全球化是社会关系以及统治和权力的一种新形式，也是作用于“全球必然性”“全球形势”“全球利益”“全球矛盾”“全球目标与目的”等范畴的相应思维类型。

另外，正如前文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段，西方涌现了对全球学的专门研究，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整合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通用参考文献范围内，全球化在本质上被视作是以下世界进程间的互联：

- 经济、政治、文化的整合和统一，曾在 20 世纪显示出巨大的热潮；

- 诸多国际因素对地区、国家和社群的生活影响加深；

- 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统一的网络市场经济形成；

- 各国愈加依赖跨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和权力野心；

- 国民经济和贸易体制愈加开放，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形成；

- 媒体和大众传媒的国际化 and 整体化，网络的流行及其向全球信息与沟通手段的转型；

- 创建“巨型社区”，这种全球化世界的重要职能和关系是“虚拟现实”也同样具备的；

- 人类共识愈发凸显，如信息、时间经济、个人主义和消费等。

当前，人们普遍地将经济因素视作全球化的推动力。最生动的范例表现在跨国企业层面上，它们利己地运用新的历史条件，并自主创造大量有利条件，同时多国实现经营。国际贸易扮演了主导角

色，以能源及其他原生资源领域的贸易为主，尤其是战略性贸易成了工业的基础。

当下，最具活力的全球化方向为数不少，包括：

- 金融机构、不同行业的游说组织、跨行业的国际组织；
- 软件、全球通信网络、信息市场；
- 人权和环保社团。

要想认识和接受全球化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只需将其视为基本经济关系、生产、分配、消费和劳动分工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地区间和大陆层面经济专业化和消费规范化的结果，全球化确实刺激了这些进程的深化演变，将其抬高至国际和全球层面。当前的经济学鼓励网络协作，依靠劳动力价格、生产力分配、地区专门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取决于资源基础和可能性。从这层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有具体的社会类型与之相对应，确切而言是从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再转向知识社会这样一个不间断的动态变化过程。

发展的过程看似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但是，事实上，至少在公众舆论形成的实践中，引领全球化认识和评估的是反全球化者，而不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艺术领域的权威专家或者全球机构的代表。从一开始，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国际流行的现象，反对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全球化推动者的人数。

反全球化是一场国际性的社会政治和反主流文化运动，集合了全球化和西方化的反对者以及全球金融、商业和产业机构。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侵害了特定国家的人权，违背和破坏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主权。这些人认为，西方（主要指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威胁了其他国家的种族文化身份，地球人口大部分都受到了最危险群体——“西方富人”的剥削，后者制造了财富的不平等，在天然和人工产品消费方面加重了歧视。

墨西哥人道主义者“副司令马科斯”（真名为拉法埃尔·塞巴斯

蒂安·纪廉·文森特)被视为反全球化的奠基人。1994年,他领导的玛雅游击队运动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夺取政权,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的开端。

次年,法国农民若泽·博韦(José Bové)砸毁了巴黎的一家麦当劳门店,这一事件拉开了欧洲反全球化的帷幕。后来,左派作家苏珊·乔治(Susan George)与博韦共同建立了激进组织 ATTAC。该组织针对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企业等国际组织,将三者并称为“邪恶的三驾马车”。

有趣的是,“反全球化”这一词语本身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还要稍晚一些,1999—2000年才在美国出现。

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前导包括新左派意识形态、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当然也少不了新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活动家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是反全球化的主要理论领袖,但反全球化拥趸更为推崇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政论作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可以说,即便当时反全球化运动没有出现,也会被人为制造出来,从其已被证明的便利性就可见一斑,它是搬运欧亚主义、新纳粹主义等各种保守观点的廉价工具。一方面,很明显,反全球化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首先,反全球化者常常在公告中公然使用极端途径来表达利益;与任何极端主义运动一样,他们也动摇了复杂的局势本身,对公众秩序造成了威胁。其次,我们无法相信所有国家的所有反全球化者能够时刻保持组织性(尤其是在活动鼎盛期)。同所有在侵略性刺激下产生负能量的无组织社群一样,反全球化组织也会被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利益诉求集中且系统化的社群所利用。后者的利益可能包括与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诋毁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抹黑全球机构与实践行为等。地方精英、经济主体、政治激进派、极右反对派、国外势力或恶意力量都可以成为反全球化者背后的隐形傀儡师,操纵他们的非法行为。

1996年，萨塔帕信徒——所谓的墨西哥“游击队”——最先制造了国际性反全球化事件。两年后，反全球化者将事件蔓延到了欧洲各国，1999年又在科隆举行了集会。

1999年，西半球迎来了规模最大的反全球化抗议浪潮，又称为“西雅图之战”。世贸组织在该市举办会议期间，5万余人喊着“动员反对全球化”的口号上街游行。由此在多国引发了反全球化者、民族主义者、左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的大量示威事件及其他抗议运动，进而促进了反全球化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大量滋生。

次年，反全球化咨询网站 IndyMedia 成立。2001年，热那亚有12万—20万人走上街头，试图中断正在召开的G8峰会。据估计，截至2003年，全世界反全球化组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500家。

另一方面，反全球化作为一项运动和政治主张，之所以说它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有明确理由的——部分全球化理念存在争议，全球化机构的所作所为也令人生疑，没有反对之声反倒奇怪。事实是，当今的全球化确实对地球上的很多人不够公平！客观体现在诸多负面情况上，如贫困、饥饿、疫病、剥削廉价劳动力、文化与社会落后以及落后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然而，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阻止了全球化就可以为全人类和各个民族带来积极的后果。从现实情况来看，回归理想化的过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向原始阶段的“软性”退化也不可能轻松美好地实现。如果我们要实现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变革，恐怕只能用更加全球化的形式来取代目前的全球化，比如通过加强人类合作与团结。

无论从历史观点来看全球化是对是错，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带来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当前它所处的阶段需要的不是终止、减缓或规约，而是转型，将其推动者、对象和过程的整合和发展推向新的层面。全球化需要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图缓解其内部矛盾、再现世界历史的辉煌前进。由此，本书将探讨的是全球化的世界，而非全球化，甚至不是全球化世界本身，因为我们从经济和道德伦理方面已经

有了不少的考虑和估计，对全球化世界的价值已经有了怀疑。从人类未来终要迈向太空来看，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可能是通向地球上人类生活组织新形式的过渡状态，是一种更成熟更理智的全球化。全球化世界秩序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佳和最终形态，但可以说是向待定正确方向转型和发展的适宜形态。

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是什么？我们将它理解为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让更成熟的全球化阶段得以持续下去的一种形态。

在历史上，全球化的条件开始形成于 19 世纪 30—50 年代（所谓的原始全球化），到 20 世纪初半段时得到完善。它们仰仗于世界贸易深化、跨国资本流动和金融保护主义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但是全球化发展的开端可以间接追溯至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开始创立政治经济议程的时候。全球化在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形势下出现，到世纪末已经经历了极大的改变，现在的我们正生活在数字时代的现实中。

在某些思想家的眼中，全球化世界具有紧凑性和扭曲性。德日进认为，全球化世界经历了“自身折叠”（replouement sur lui-meme）。矛盾的是，在生存时间和空间方面，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到欧洲移民踏上美洲大陆，再到连接人类的互联网出现，每次新发现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广阔，反而使得世界收缩，仿佛变得比从前更小！今天，受全球通信系统、航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文明病的影响，世界完全被人类互联起来，依赖其中的全部主体，世界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紧凑、扭曲和折叠的性质主要与空间和时间、运动和沟通、决策和选择可变性具有关联。我们无需走出家门或办公室就能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取得联络，无论多远的距离都能在数小时内到达，这样的能力让人们对边界和距离以及自身资源、需求和目标有了不同的认识。传统世界观特有的平面参考系被数字世界观的典型球面参考系所取代。球面宇宙表现出了不同的暂时性特点，比平面宇宙要短暂